

# 寒冷的街头,还有多少“陶家孩子”

社会热点

□ 魏英杰

经排查, 贵州毕节 5 名非正常死亡儿童的身份已确认, 七星关区分管民政、教育等相关负责人及小学校长共有 8 人受到了严肃处理。这些孩子系当地 3 名陶姓兄弟之子, 最小的 9 岁, 最大的 13 岁。陶氏三兄弟同时失去了 5 个孩子, 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候, 实在不忍心再去责备他们为何未

尽监护之责。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外出务工或忙于农事, 他们整日奔波劳碌, 何尝不是为了这个家庭。只不过, 父母常年在外, 与子女缺少交流, 势必影响子女健康成长。5 个孩子中有 4 个处于辍学状态, 且经常外出不归, 足以说明问题所在。让人痛心的是, 这并不只是少数家庭的问题。留守儿童缺少家庭关爱, 教育问题突出, 极易遭受意外伤害, 这些现象近年来已多有披露。这场悲剧的发生, 对留守儿童问题再度敲响了警钟。中国农村约有 5800 万留守儿童, 该如何从各方面关心照顾这一群体, 实在不容漠视, 更不容消极对待。否则, 说句并

非危言耸听的话, 陶家孩子的命运很可能成为其他留守儿童的明天。但这起悲剧暴露的还不仅是留守儿童的现状。陶家的孩子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死亡地带, 与家庭、学校、执法机关、救助机构等保护机制的节节失守直接相关。在脱离家庭和學校以后, 陶家孩子在外开始流浪生活, 这等于进入了社会救助的领域。他们在外流浪的 3 个星期, 也对当地社会救助体系形成了考验。而事实表明, 无论在哪个环节, 当地相关部门都未能切实履行职责, 及时对孩子们伸出爱的双手。不妨回顾若干细节。陶家孩子离家几天后, 家长向警方报案, 警方却直至悲剧发生才“找到”他们。

这让人怀疑, 当地警方有无积极寻找过, 又是否将相关信息登记上网。事发路段距街道办事处步行仅需 1 分钟, 然而相关动态也未引起留意。在寒冷天气下, 当地社会救助站更没有发挥作用, 让这些孩子得到应有庇护。正因为这些责任部门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使得悲剧变得难以挽回。面对这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处罚相关责任人或许是比较容易的部分。从长远来讲, 该如何加快完善儿童权利保护机制, 让广大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得到及时保护与救助, 才是问题的重点与难点。着眼于当前, 各地相关部门应当行动起来, 加大力度摸底排查, 看辖区內

是否出现流浪少年儿童, 并及时展开救助。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 亲生父母也无权随意对待子女。相关部门一旦发现流浪儿童, 应采取各项措施坚决保障未成年人应有权利。陶家孩子的悲剧, 不能再发生了。孩子有未来, 国家才有希望。一个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状况, 既取决于这个社会的人权进步程度, 也将影响这个国家今后的社会健康指标。全社会都来关心孩子, 把孩子的事情放在头等位置, 才能为社会赢得未来。当我们为陶家孩子的命运痛心不已时, 别忘了在寒冷的街头, 可能还有更多的“陶家孩子”。

画中有话

□ 文/胡艺 图/刘道伟

广东省揭阳市岐山汽车站 2001 年动工建设, 2004 年建成, 耗资 2800 万元, 至今未能投入使用。目前, 该站只有一名总经理在正常上班, 据其介绍, 该汽车站位置偏僻, 站场前后的道路狭窄, 大型客运车辆掉头都有困难。他曾多次申请重新规划和改造, 但负责领导更换频繁, 事情一直没有下文。既然位置偏僻, 附近道路狭窄, 当初有关部门与领导为何选址于此。相关部门履行了征求民意, 科学论证汽车站选址的程序没有? 另外, 汽车站已经建好,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针对当地迫切

需要汽车站与岐山汽车站闲置的实际, 当地有关部门为何不可以修建周边道路, 开通短途公交, 完善配套设施, 让闲置的汽车站焕发生机与活力? 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领导变更频繁, 可《城乡规划法》规定, 城乡规划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更, 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意见擅自修改。如果说当初选址偏僻是拍脑袋决策甚至是决策失误的话, 任由汽车站闲置浪费、风雨飘摇, 纳税人的钱打水漂, 一茬又一茬的后任领导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此事不仅当地有关部门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尽快采取补救措施, 改变旧车站车满为患, 新车站闲置浪费的现状。而且上级有关部门不能只管拨款、立



项, 而要积极介入调查, 查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问责相关责任人, 妥善解决问题。要终结汽车站闲置八年之类的闹剧, 在笔者看来, 关键要健全两套机制。一是决策失误责任

追究制度, 改变短视规划状态, 做到科学规划, 精细监管。二是创新政绩评价体系, 保持对官员政绩考核的连续性, 督促官员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

“全额罚息”  
别拿国际惯例说事

□ 钱凤伟

央视日前报道了一名持卡人透支 11 万元 5 年后要还 44 万元的事件, 再次引发市民对信用卡全额罚息的质疑。对此, 曾有专家表示, “全额罚息是国际惯例”是偷换概念。实际上, “罚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利息只能按借贷金额按利率收取, 不是可以“罚”的, 更遑论“全额罚息”, 对已经还的钱也要“罚息”, 天下哪有这样的“国际惯例”? 作为国内最大信用卡发卡银行的工行, 已经取消信用卡部分还款逾期全额罚息规定, 足以表明“全额罚息”并非不能取消。其实, 即使有这样的“国际惯例”, 也并非“全额罚息”就有了正当性。“国际惯例”的确立本来就十分困难, 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版本, 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所谓“国际惯例”, 多指国外的一些通行的做法, 并非属国际法强行规范的国际惯例, 本来就不必当回事。而且, 有些被称为“国际惯例”的做法, 只不过是相沿成习, 并无多少道理, 其中还不乏不合情理将错就错的。更何况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 即使是人家通行的惯例也未必就适合我们的国情。至于所谓“符合银监会规定”, 更不是理由, 众所周知, “银监会规定”并非法律。“银监会规定”也要首先合情合理合法。仅仅因为不成比例的尾款, 却要使已经还到银行手里的借款受到“株连”, 并被“陪绑”收取高额的“惩罚性”透支利息, 明显是既不合理, 也不合法: 欠债还钱, 还是所欠之钱, 即使要因透支而受到“惩罚”, 也是加罚所欠之钱的利息, 与已经还清的债何干? 也正因此, 即使有如此“规定”, 也早该修正。其实, “全额罚息”说白了是银行的生财之道, 由于 ATM 机不能识别零钱, 用户还款欠零头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 总会有人出错, 比如记错了还款数额。而几块钱的欠款也会因此产生较高的利息。据计算, 按未偿还的部分来计算利息, 与全额计息相比, 两者相差 6800 倍。“全额罚息”实际是有的银行片面追求利润而不惜损用户利益的招数。一是利用“霸王条款”, 店大欺客, 把不公平的规定强加给用户。二是利用用户对条款不熟悉、不仔细而出的“差错”, 昧心赚钱。“全额罚息”穿上“国际惯例”的马甲, 可以自欺, 却欺不了任何人。实际上, 全额罚息不过是一味追求利润的短视做法。显然, 在当今的竞争态势之下, 如果依然“欺负”客户, 这种做法对于银行的生存和发展, 其实是贪小失大。

## 质疑“9 分入围面试”, 别偏离靶心

□ 余宗明

在温州一事业单位公开选调中, 一考生考取 9 分进面试, 而 3 位考取 50 多分的考生却未获得面试资格, 这引发网民质疑。对此, 该单位负责人回应: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报名该岗位的考生太少, 考 9 分者已在面试环节出局。“9 分入围面试”, 委实不乏噱头, 它像是一根寓意丰富的引线, 迅即引爆了公众的负面想象, “舞弊说”“猫腻论”也甚嚣尘上。这般“有罪推定”, 可以理解为: 在招考成“暗箱操作”重灾区的情境中, 人们难免对“蹊跷”心怀警惕。而“9 分入围面试”, 也易引发习惯性质疑, 被视作

“内定式招录”的又一标本。但猜疑归猜疑, 真相还需厘清。“9 分入围面试”, 确实够悬疑, 可断言它背后暗流汹涌, 未必靠谱。与其预设立场, 不如拾掇细节, 拼接真相的“版图”。招聘人员解释, 此次招考中, 十几名考生报考的并非同个岗位, 入围面试的分数门槛也因岗而异, “9 分入围, 50 分出局”看似荒谬, 抹消了岗位竞争中的类别差异, 由此得出“逆向淘汰”的结论, 有些偏颇。毕竟, 不同岗位竞争强度不一样, 不能“跨岗位”地横向比较。据了解, 笔试仅得 9 分的考生, 报的是文化馆, 而文化馆报考者总共才 3 名, 按照 3:1 的面试比例, 三

人都有面试机会。当然, “入围面试”不等于拿到了被录用的“入门券”, 只要面试公平, 遵循分数累加、优胜劣汰的原则, 就谈不上“猫腻”。而考 9 分者在面试环节的出局, 也证伪了许多人的经验化推断。因而, “9 分入围面试”, 未必就链接着不堪的内幕。臆测先行, 固然能让疑点浮出水面, 可有时也会造成误判。归根结底, 质疑与盲信之间的沟壑, 还须用“理性判断”的负责任精神来填平。不过, 剥离了依附于“9 分入围面试”之上的灰暗想象, 不意味着它完全合理。说起来, 低分“按招聘流程走”, 最终入围面试, 这并非首例。今年 4 月, 三亚事业单位招聘中, 某

岗位入围者最低分成成绩仅 4.55 分, 也激起非议。尽管它合乎程序, 可入围门槛过低, 仍引起争议——假如“按照规定来”就够了, 那岂不是零分也可入围? 招考终究指向着“选贤任能”, 如果因报考人数少, 就门槛放低, 无疑背离了选优的目的性。这也吁求, 尽早填补进入门槛漏洞——在有些地方, 在依循面试比例的同时兼设最低合格线, 就不失为好法子。现实剧情, 未必总和我们预想的脚本如出一辙。所以, 不必把“9 分入围面试”牵强地和“萝卜招聘”扯上边。或许, 真正需思考的, 是如何在走流程和“选优”的指向之间, 建立一种兼顾的平衡机制。

## 投票越容易, 业主越积极

□ 谭敏

《广州市物业管理办法》日前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出要借鉴深圳、北京等地的做法, 建立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系统, 解决业主大会召开难、投票表决难等问题。这对于目前面临业主公共参与意识不强、难以组织等诸多难题的业委会来说是个好消息。小区物业管理的实质与核心在于业主自治。可是, 作为业主自治的基本机构——业委会, 且不讨论其成立过程有多艰难曲折, 即便只看已成

立的业委会, 也面临着工作开展难等各种问题。据媒体的一项调查表明, 作为业委会工作一度走在广州前列的番禺区, 自 2007 年《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 近百个业委会到去年为止, 仅剩 29 个还在正常运作。为什么业主自治会面临困境, 除了在业委会成立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阻挠依然存在之外,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有的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有的因为工作忙, 很难有时间参与小区事务; 二是不少小区面临换届选举, 按照目前的管理规

定, 犹如把业委会推倒重来, 要重新组织超过六成的业主参与换届, 并非易事; 三是业委会事务繁琐, 主要就靠几个业委会成员长期与物管和开发商打交道, 频频遭遇冲突和威胁, 一些业委会成员无法坚持, 导致业委会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这些问题的存在, 很大程度还在于小区业主的公共参与意识不强, 遇到全体业主利益受损时容易组织人员参与商议事务, 可是, 正常的小区公共事务, 关注的人却较少。比如, 动用维修基金、物管解聘续聘等重大事件往往需要业主签名表决, 但在具

体实施时, 上门找人不容易, 回收表格难, 很难搜集到足够数量业主的投票。而且, 小区业主利益分化, 意见难以统一。小区自治是个新事物, 要提高全体业主参与小区公共管理的意识, 培养自治精神, 并非一日之功, 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等现代科技手段, 可以使得业主在投票表决上更便利, 客观上降低了公共参与门槛与难度, 有助业主们逐步养成关心与参与小区事务的习惯。只有全体业主都积极参与到小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 小区自治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